

宋仁宗与惠州

统筹策划 陈骁鹏 马勇

# 文教事业有赖经济支撑： “惠州城下有江南”

作者 / 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文化教育的发展以经济为基础。宋仁宗后，惠州文教兴盛，这自然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助力。先是宋仁宗朝的知州陈偁两次主政惠州，疏浚西湖，推广小麦种植；后有苏轼贬谪惠州，不仅给惠州留下千年诗名，更留下来自中原的先进农具；此后，鱼盐、铸钱、陶瓷等经济支柱相继崛起，成了惠州文教事业井喷式发展的有力支撑。

百里东江，自古是黄金水道，渔盐酒茗，集于一市。当时的惠州，已成为岭南地区最繁华的几个城市之一，人文、风物甚至能与中原地区媲美。正如之后的北宋诗人唐庚在《西溪》诗中所说：“百里源流千里势，惠州城下有江南”！



北宋时引种小麦，惠州才有了面食文化，后来还创出了著名的“伊府面”

插图 / 杜丹

## 贤太守引入小麦种植技术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贞观年间，惠州地区人口只有6891户，至“开元盛世”的天宝年间也不过9525户，社会经济以农、渔业生产为主，经济相当落后。

人宋后，尤其是宋仁宗时的政策促进南方发展。《元丰九域志》记载，仁宗朝后十几年的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惠州总户数已达到61121户。其中主户23365户，客户37756户。客户即外乡、外县移居本地的佃户和“射耕人”，已占惠州总户数的61.8%。大量移民的进入，反映了这个时期惠州社会经济规模迅速扩张。

这一时期朝廷派到惠州

的官员，也很重视发展生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陈偁。宋治平三年(1066年)，仁宗驾崩的第三年，此前仁宗朝时就曾任惠州知州的陈偁再次知惠州。这次，他推动惠州民众大规模种植小麦。

惠州种植小麦的最早记载，见于郑侠所撰《西塘集》。“南民大率不以种艺为事，若两麦(大麦和荞麦)之类，盖民不知也。公始于南津间地，教民种麦，是岁大获，于是惠民种麦者众矣！”这里所说的“南津”，本地人称“麦地”，也就是今南湖南岸至麦地路之间。

陈偁任惠州知州时所筑的湖堤被人称为陈公堤，即今天城区通往丰湖书院的黄

塘堤。陈偁走后约30年，苏轼游博罗香积寺，看见路边“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禁不住用“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的诗句，来表达丰收在望的喜悦。这说明，此时惠州已是大面积种植小麦并获得成功。

粮食生产的发展，无疑为宋代惠州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除小麦外，荔枝、药材和茶叶也是宋代惠州农业生产的重要项目。罗浮山的药市和水北的荔枝浦，在当时闻名遐迩。宋咸平二年(999年)，陈尧佐任知惠州，在徐山太守东堂(今惠城区教育局附近)手植荔枝，把优良品种引进惠州。

## 渔盐制瓷等发展成经济支柱

钱业和盐业，特别是盐业，是宋代惠州经济支柱。惠州有漫长的海岸线，渔盐历来是惠州财政收入之大宗。惠州府城是各县渔盐山货的集散地，唐庚寓惠州期间就曾写下“利倾小海鱼盐集，味入他村酒茗甘”的诗句。

据史载，宋代广东有盐场17个，惠州占了3个，分别为归善淡水盐场、海丰古龙盐场和石桥盐场，均属官府所有，当时有“今日财赋，霁海之利居其半”的说法。《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宋绍兴三年(1133年)，惠州的3个盐场则课利5万多贯，推断年产量为100万斤以上。

北宋宣和年间的惠州金判陈鹤用“捐盐仓箩头钱置学田以增廉”的方法解决办学经费，是惠州置田赠学的最早记载，说明盐业在宋代惠州，是官府办学的重要经济来源。

宋代惠州的另一支柱产业是铸钱。《宋史·食货志》载，宋熙宁四年(1071年)，惠州设置阜民钱监，这是当时全国十六个钱监之一，且为全国第二大监。近年惠州一些采沙船在东莞大桥附近采沙时，采出约一万枚全新“崇宁通宝”折十大钱，铁划银钩，字体清晰，说明惠州铸钱有很高的工艺水平。

阜民钱监也是当时惠州规模最大的手工生产作坊。若参照南唐时期一个铸工年铸铜钱一千五百个的标准推算，年铸量为七十万个的阜民钱监约需铸工500人，另加翻沙制范、烧窑看火、加工磨铁、冶官监卒、护卫后勤以及原料、燃料供应、

产品储存输送诸色人等，用工规模或达千人以上。

陶瓷业在惠州也是传统产业，最早可上溯到3000年前的缚娄古国时期。惠州发现有宋窑遗址多处，如三栋瓦窑岭、朱屋村等等，其中位于城区东平窑头村的宋窑遗址规模最大，面积达40万平方米，是北宋广东三大民窑之一。据专家考证，该窑从北宋初年开始烧造瓷器，生产历史长达100多年。该窑址于1976年被发现挖掘时，出土瓷器、窑具等650多件，种类繁多，造型美观，技艺精巧。

东平窑的瓷器主供外销，尤以白瓷最著名。近年来有国外学者在考察研究东南亚、西亚、非洲北部的古瓷器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产自中国广东。惠州北宋东平窑址的白瓷正与东南亚一带所见白瓷相同。当年，通过广州港外销的陶瓷数量巨大，内中包括惠州的产品。在东平窑遗址出土大量铜钱中有越南的“天福镇宝”钱，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

制盐、铸钱、制瓷诸业的兴旺，促进了惠州水运业的发展。东江是粤东黄金水道，惠州又在东江和西支江交汇之处，各地商品集散于此，水道一片繁忙。宋代广州与惠州已有定期班船，惠州区内客渡更定，如博罗从县城南门至石湾的东江流段上便有十三渡运

客人。宋绍兴二年(1132年)，名儒罗从彦于罗浮创建钧枢书院，就是靠收取这东江十三渡的税捐“以贍来学者”，是书院稳定的经济来源。

小水和水稻的区域变迁史，本身就是人类文化史。当年苏轼在惠州时，恰好感受到了这种变化。那一刻的感受，借助于他的诗文，得以留存至今。现在的我们看到这首诗，不禁不会心一笑，仿佛也看到了东坡当年所见的原野风光！

## 文脉今昔

# 千年制盐技艺 有望成旅游民俗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濒临南海的惠州惠东，自古得渔盐之利，惠州人从事海盐生产有近千年历史。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手工盐业逐渐走向衰落。如今，这一传承千年的技艺正在谋求新发展，有望通过开发特色文旅项目，重新成为惠州的金字招牌。

## 手工制盐难以适应社会发展

从宋代开始，制盐业成为惠州社会生产重要部门。《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广东沿海开辟15个盐场，其中淡水盐场就在惠州归善县，即今惠东县平海镇东部。

1985年，惠东县盐田总面积748公顷，共分为3个盐场。进入90年代，县内各盐场面积锐减，至1995年全县共有盐田603公顷。

惠东县稔山镇长排村是一个传统制盐村，不少村民靠晒盐为生，曾有专业盐民3000多人。时至今日，当地仍保留着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百亩盐田，沿用传统晒盐方法。涨潮时，海水就从水渠引进来，经过第一格池停顿过滤，然后进入第二格池，层层过滤。海水在盐池中经日晒风吹，水分渐渐蒸发，最后结晶成盐。

传统方法晒盐很辛苦。“赤日炎炎似火烧，盐叮粒粒汗中熬。辛苦劳累谋生计，大爱真情日月昭。”这是盐农后人、惠东县稔山镇大墩小学教师罗宣景为自己辛苦耙盐一辈子的父母所作的诗句。他说，制盐是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但由于劳动负荷重，收益不高，盐农的下一代基本都不传承祖业了。

## 古老技艺有望变成旅游项目

今天，惠东的“四色旅游”标签中，“古色”占比颇重，盐业、稔山、港口附近的产盐文化依然浓厚。随着当地盐业的淡出，惠东的盐民也在谋求新发展。

历史上，惠东县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属于半渔半盐地区，盐业曾是当地的重要产业。如今，手工晒盐场所已成港口文化遗迹的一部分。不少盐农选择把盐田改造成海产品养殖池；也有人坚守传统工艺，不愿放弃。

在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内的港尾等村民小组，有许多天然沙滩，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游玩。利用这一资源，当地盐民纷纷发展渔家乐、民宿等旅游业，目前全村民宿约有50家。

惠东县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对于古盐场感兴趣，未来当地有望将海水晒盐的生产民俗开发成旅游项目，游客可以亲眼观看展示，也可以参与其中。



传承千年的手工晒盐手艺，有望通过打造特色文旅项目重获新生  
惠东县新闻中心供图

## 文脉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 盐业催生惠阳望族「邓承修家族」

据《两广盐法志》记载，清乾隆22年，“惠州所属八场，岁产盐斤将及百万包，以通省而论，惠州居其大半”。清代惠盐通行广东，也培育出诸多盐商，其中惠阳的邓氏家族最有名。邓氏家族曾经营盐业富甲一方，后代中培育出“铁笔御史”邓承修、革命烈士邓仲元等众多才俊。

盐是 中国历代王朝控制极严的货物，盐商是一个好营生，产盐多的地方，自然会让某些人暴富。镇隆崇林世居，淡水两秀新居和秋长早期的一些大型围屋，都是盐商建造的。其中，淡水邓氏的开基始祖邓奕贵，就靠着贩盐，一举开创了邓氏富甲一方的传奇，并给后嗣几代子孙留下了巨额财富。

此后，邓氏家族开枝散叶，后裔子孙中人才辈出。邓承修是清代咸丰十一年(1861年)举人，历任刑部郎中、浙江道、江南道、云南道监察御史、鸿胪寺卿等官职。任御史时，他大胆进谏，弹劾权贵，痛陈利弊，人称“铁笔御史”。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又在淡水创办崇雅书院，即今天的崇雅中学。晚年，他主讲丰湖书院，一心扑在家乡文教事业上。

民国时期，不少邓氏后裔投身革命。像同盟会元老邓仲元，曾任广东军政府陆军司司长、粤军总参谋长兼粤军第一师师长，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光复惠州、讨伐袁世凯、驱除龙济光、统一广东等战役，功勋卓著。他逝世后，国民政府还确定每年3月23日为“先烈邓仲元先生殉国纪念日”。广州、惠州、梅州等地先后建立以邓仲元名字命名的学校、医院、图书馆、街道等。



惠东港口附近，盐农们辛苦晒出的盐堆成了小山  
惠东县新闻中心供图

## 苏东坡推广中原先进农具

苏轼贬谪惠州，把中原先进的农具及其使用技术也带来了。

我国传统的农具到宋元时期已基本完备。据元人王祯所撰的《农书》记载，宋元时期全国有农具105种，其中除传统旧式农具外，许多是宋元时期创新改造的新式农具，如踏犁、筒车、秧马、水磨等。在岭南，秧马、水磨这些先进农具，就是在苏轼的积极推广下，首先在惠州开始使用的。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行经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在庐陵属下的西昌(今江西泰和)遇上宣德致仕郎曾安止。曾安止将自己写作的《禾谱》一书请苏轼过目，苏轼读后，觉得该书“文既雅温，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于是向曾安

止介绍了秧马的作用和形制，并作《秧马歌》教人使用。到了惠州，苏轼又把秧马介绍给博罗县令林抃。林抃因地制宜，略加修改，制成“加减秧马”。使用秧马前，农民拔秧，“俯偻秧田，非独腰脊之苦。而农夫例于胫上打洗秧根，积久皆至烂烂。今得秧马，则又于两颊子打洗，又完其胫矣”。秧马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保护了劳动者。很快，“惠州民皆已使用，甚便之”。

龙川令翟东玉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找苏轼索取秧马图纸，带到龙川推广。苏轼离惠十余年后，唐庚来惠，沿途看到农民普遍使用秧马，写下了《到罗浮始识秧马》诗，其中有“从此驰君四十年”一句，表达了对苏轼勤民

恤农精神的追慕之情。

以流水为动力的碓磨，在当时也是一种先进生产工具。明末应星《天工开物·攻麦》中记述，每副水磨每天可磨麦六石，相当于20个强壮劳动力的工作量。宋绍圣二年三月，苏轼在惠州作《游博罗香积寺》诗的小序中说：“寺下溪水，可作碓磨。若筑塘百步，闸而落之，可转两轮举四杵也。以属县令林抃，使督成之。”

此前，陈偁也大兴水利，在丰湖“筑堤捍水，延袤数里，中置水门备潦，叠石为桥上，鱼利悉归民”。当时遇到大旱，他又“教民以牛车汲水入东湖溉田，民赖其利”。苏辙继任后，也“为文论民力学种麦，垦荒田、修陂塘、去妾乐、禁杀牛”。

主要决定于水田和旱田的分布。而这，又主要决定于气候条件。

不过就是同一个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气候也会有些许变化。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研究，历史时期的气温会有上下波动，这会导致水田旱田分布的变化。于是，气候温暖时降水多，水稻分布就变广；气候变冷时天干少雨，小麦就乘机扩展“势力范围”。

据考证，惠州在岭南率先种植小麦，也和气候变化有关，南北宋交替至南宋这段时期，正处在气象史上的寒冷期。这时旱地面积变大，南方出现了更多旱田，此时惠州能成功引种小麦，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气候变化会引起水稻小麦面积增减外，还有社会学层面

现了水稻种植。而在南方的一些地域，小麦也有种植。比如在岭南惠州，宋代大文豪苏轼被贬到这里时，就惊喜地看到了麦浪。

那一日苏轼在前往博罗香积寺的路上，看到“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于是他用了“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的诗句，记录下了当时的喜悦心情。

在大海之滨的岭南看到小麦，让长期在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为官的“中原人”苏轼感觉新奇而亲切。

其实，那时候惠州种小麦已经好多年了。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陈偁任惠州知州，曾推广小麦种植，使得这种来自北方的农作物在岭南落地生根。水稻和小麦的“地盘”划定，

## 苏东坡见证的小麦水稻“地盘之争”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文史杂谈